

# 身分和差異

## 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高華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 身分和差異

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高華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 作者簡介

1954年5月出生於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歷史學博士。研究專長為中共黨史、民國史、當代中國史。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鳴謝

2001年3至4月，我以《「階級出身論」和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的題目申請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做訪問研究，利用該中心收藏豐富的當代中國史資料，對自己原有的研究文章進行了修改、充實，最後完成了這項研究。在這充滿濃厚學術氛圍的環境裏，我不僅獲得了知識的增進，還享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友誼，在此謹向關信基教授、熊景明女士和各位工作人員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 香港中文大學 2004

ISBN 962-441-717-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身分和差異

## 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 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是血雨腥風，進入二十世紀，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民國肇立，清朝退亡，新政權沒有對前朝人物大開殺戒。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上台，建立黨國體制，奉反共為基本國策，以武力鎮壓共產黨，激起中共的長期武裝反抗，毛澤東有名言：蔣介石拿起刀，我們也拿起了刀。從此國共兩黨，兵戎相見，即使在抗戰階段，雙方為共禦外侮，結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 年後又有三年內戰，最後中共勝利，國民黨敗退台灣，在長達 22 年的時間裏，國共長期武裝對抗，無數百姓被捲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犧牲。

自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東西方陣營對峙的冷戰大格局下，中共創設制度，開始了重建國家和社會的過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對舊政權及其人員，以及「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的政治清算來展開的，其思想和實踐的背景是：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另一來源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

勝利者對舊政權及其成員，以及「階級敵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其具體路徑就是「劃分階級成分」。在近 30 年間，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成員的階級出身問題，將階級出身作為檢測民眾對新政權政

## 2 身分和差異

治忠誠度的重要識別標誌，並通過此項檢驗，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權基礎。由此出發，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的變化，對社會成員不斷進行政治身分類別的劃分和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這種強調階級出身的思想意識和依此劃分社會成員政治類別的原則，在本文中被指稱為「階級出身論」。

執政黨的這套思想和組織原則在 1950 年代初開始在全國貫徹，但其歷史淵源悠遠，1928 年 1 月 24 日，毛澤東為江西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sup>1</sup> 1950 年代後的實踐只是 1949 年之前中共根據地實踐的延伸和發展。在建國後的 17 年裏，「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歷經幾次變化，在 1960 年代初中期成為新政治文化中的強勢意識，對國人的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1966 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長期鬥爭的繼續，「階級出身論」迅速轉化為「階級血統論」，從而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歧視現象。1978 年，黨和國家終結了這項政策，從而大大解放了社會，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也標誌著新政權以嚴刑峻法奠定統治基礎的歷史階段的結束，國家進入了和平建設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對於「階級出身」問題和文革的關係，除了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的處境下發表的《出身論》一文，在 1980 年代，大陸思想學術界對此問題也曾有所論及，但是對此議題的反思並沒有延伸到「階級出身論」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的表現形態，更沒有將這個問題置放於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下予以系統考察。1990 年代後期及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有關這一議題的零星敘述和民間回憶錄，對於瞭解「階級出身論」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表現形式，以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廣泛影響，特別對於觀察當年中國社會的另一廣大人群及其家屬的生

存和生活狀態，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敘述極為零散，多數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試圖將「階級出身論」置放於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梳理這一重大問題，之所以選擇 1949 至 1965 年為論述的中心，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考量：這一階段的「階級出身論」現象一向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對較關注於文革期間的「階級血統論」問題，而瞭解「階級出身論」的社會歷史根源，特別是剖析建國後 17 年的「階級出身論」現象，則是瞭解文革「階級血統論」的入門，因為後一問題是前者的必然發展和內在邏輯的延伸。

本文以綜合論述的方式探討「階級出身論」的歷史背景和建國後 17 年的表現，所依據的材料為四類：中共歷史文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資料、前蘇聯有關中蘇關係的部分檔案資料，以及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資料。筆者認為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議題進行客觀研究是有意義的，並希望能通過這項研究引致後來的研究者繼續關注和探討這個重要的議題。

## 「階級出身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

中共以「階級出身論」作為一項重要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始於 1927 年秋蘇維埃運動初興之際，它是中共對國民黨鎮壓政策的一個激烈反應。1927 年國共分裂，中共被國民黨鎮壓，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思想全面進入中共，與之相隨，「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迅速興起。「階級出身論」的要義為：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依此邏輯，支持國民黨反共的階級、階層為「敵人」；支持、擁護中共的則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為工農階級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經驗，在第三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列寧主義

#### 4 身分和差異

政黨，在 1921 至 1927 年這一階段，雖然在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革命同盟軍的組織方面，已經初步顯示出唯階級出身的傾向，但是在這個階段，中共又宣布現階段中國革命為資產階級民權性質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針對目標是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軍閥，故此中共對其他階級的態度還比較溫和，更說不上對本黨黨員採取「階級出身論」的立場，中共的組織構成中，知識分子黨員也佔了較大的比重。據陳獨秀在 1927 年 4 至 5 月召開的中共五大所作報告稱，至 1927 年 4 月，知識分子黨員佔全黨黨員人數的 19.1%，工人佔 50.8%，農民佔 18.7%。<sup>2</sup> 在 1924 至 1927 年大革命中，中共組織獲得迅猛發展，並初步在工農運動中取得領導優勢，但中共的階級意識還未充分成熟，即使在農運較為展開的湖南、江西、湖北，農民階級反抗農村舊勢力的行動只限於給土豪劣紳「戴高帽」、「游鄉」，還未發展到對地主階級施行肉體消滅。蔣介石對中共的暴力鎮壓和國民黨大規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開始了對國民黨的長期武裝反抗。

「階級出身論」的興起與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組織構成的最新變化也有著密切的關係。1927 年後，隨著中共逐漸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民黨員在黨的構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與此同時，知識分子黨員在中共的危難關頭大批退黨，帶來了全黨上下，尤其是黨的領導層對知識分子的深刻的負面認識。這就是，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和戰爭環境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共產黨員，極易動搖叛變，而促使他們動搖叛變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以及他們與舊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從未受到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且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與地主、資產階級存在根本衝突的工農階級。1927 年國民黨「清黨」後，茅盾創作《蝕》三部曲，被中共認為：「這是用小說寫他的思想，…… 當時黨認為這就是他的退黨宣言，…… 從此以後，他不找黨，黨也不找他。」<sup>3</sup>

「階級出身論」興起的國際背景是斯大林的「清黨」經驗對中共的影響。1927年後，中共中央選派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黨員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其他軍政學校學習，此時正值蘇共開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黨內鬥爭，中國留學生也全部捲入。在蘇共「清黨」中，實行以階級出身鑒別黨員的嚴格政策，凡工農出身的黨員可以重新登記拿到黨證，但非工農階級出身的黨員則一般降為候補黨員，這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被套用，對黨員的思想影響極大。<sup>4</sup> 隨著在蘇聯學習的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蘇共的這種唯階級出身的思想和組織方法迅即傳播開來，並與根據地內已經出現的「階級出身論」完全匯合。

從 1920 年代末開始，中共黨內的「階級出身論」已滲透到黨的思想和組織工作的廣泛領域。1927 年中共「八七」會議上，首次提出提撥工人幹部的主張。在 1928 年中共六大後，提拔、重用工人階級出身的幹部成爲一種新的流行現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黨員被任命爲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包括向忠發（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羅登賢（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福坦（臨時政治局委員）、陳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張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陳雲（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任命的中央委員，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項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鄧發（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譚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唐韻超（原名唐宏經，中共六大中央候補委員）、余飛（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顧順章（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周秀珠（中共六大中央候補委員）、蘇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徐錫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中央委員）等數十人。



## 6 身分和差異

與提拔、重用工人幹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中共創建江西等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最初歲月，就已表現出對非工農出身黨員的排斥態度。在短暫的海陸豐根據地時期，工農出身的幹部開會時可坐在前排，知識分子幹部則被要求坐在後排。<sup>5</sup> 1928年9月，中共湘贛邊界黨組織在井崗山地區首次開展了一場以清洗黨內地富出身黨員為目標的「洗黨」鬥爭。<sup>6</sup> 在戰時氛圍下，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雖然經受過嚴酷的鬥爭考驗，但這並不能使根據地領導人相信，他們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會立場堅定、革命到底。而在紅色區域，確實也存在著個別知識分子黨員卷款潛逃或脫隊叛變的事例，這就更使得推行「階級出身論」有了理論與事實的證據。

1927年後，革命的主體已從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階級，中共依靠由貧苦農民組成的紅軍，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在黨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中，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激發他們對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仇恨，佔了最重要的比重。廣大農民出身的黨員作戰英勇，對敵鬥爭堅決，儘管他們對馬列理論知之甚少，但是，農民出身的黨員所具有的「樸素的階級感情」、對革命的忠誠，以及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的立場與態度，成為凝聚革命隊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動力。中共相信，憑藉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完全可以在蘇區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

在蘇區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階級出身論」逐漸成為黨和軍隊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和組織原則，其中除了領導機關有意識的推動之外，蘇區「軍事第一」的客觀環境也使得這觀念漸趨制度化。在根據地的組織工作領域，除非在莫斯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軍事鬥爭中表現英勇，取得戰功，被認為是經受過嚴峻的戰爭考驗，知識分子幹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蘇維埃政權機構從事宣傳和文教工作。這樣的安排有時也會出現例外的情況，但大致成為組織工作中的傳統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據地幹部中造成一種印象，這就是知識分子幹部不

適合做最重要的軍事工作。在「軍事第一」、槍杆子決定一切的年代，文職幹部在黨內的地位自然低於軍事幹部。而知識分子黨員也完全認同了「階級決戰」的口號，對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視性的安排，多能從黨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階級出身論」就成爲了一種公開的思想意識。

在濃厚的唯階級出身的氛圍下，根據地內逐漸出現幾種普遍的現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受到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歧視，在鄂豫皖地區，知識分子幹部被貶稱爲「白腿杆」，意即沒有實際鬥爭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識分子不得不故意裝成文盲。1930年代初，在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仇視和亂殺知識分子的現象最爲嚴重。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僞裝成文盲，唯恐因識字而遭清算。<sup>7</sup>其二，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地富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一般都會首當其衝成爲被鬥爭對象，甚至遭到肉體消滅。

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江西蘇區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sup>8</sup>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實際行動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終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越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

## 8 身分和差異

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迹。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澤東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隨後展開的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 AB 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於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 4,400 餘名「AB 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 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sup>9</sup>

需要強調的是，1920 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據地都是黨的知識分子幹部率先開創，而堅持「階級決戰」路線，在蘇區全面推行工農階級優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層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也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只是他們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同，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等基本為葛蘭西所稱的「有機知識分子」，即以革命為志業的新知識分子。除了張聞天等個別人，這些人大多沒進過大學，或者所受的大學教育為時較短，即使留學出洋，也多為勤工儉學性質，基本未受西方學校正規教育的訓練。1920 年代中共領導人知識背景上的另一個特點是曾赴蘇聯學習，這種學習基本為政治理論性質的培訓教育，不管留蘇時間長短，蘇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如階級鬥爭、暴力革命、鎮壓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1928 年中共六大，布哈

林代表共產國際作報告，對陳獨秀、彭述之等「大知識分子」大加嘲諷、批判，更將疑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從此深埋入這批留蘇幹部的心中。這批幹部返國後大多進入黨的領導層，這就使得輕視、防範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增加了神聖化的色彩（對知識分子的負面批評來自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共產國際），也更具有了說服力（知識分子出身的黨領導人也需要進行不斷的思想改造，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國際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時期，在貫徹「階級出身論」時也是有相當彈性的。黨在白區的鬥爭策略是，一方面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積極在工人、苦力和社會底層的貧苦群眾中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同時，重視團結，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吸收其中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有明確認識、對國民黨統治表現強烈不滿的一部分人參加黨的組織。即使對於某些資產階級中上層知識分子，以及舊軍官和舊政客，中共也採取爭取一切可以團結和利用的力量的策略，並不在意他們的階級出身，只要這些人承認中共黨綱，願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貢獻，皆可被吸收為秘密黨員，如楊度、胡愈之、王昆侖等都是在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成為了秘密共產黨員。

在 1928 至 1931 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支持和推行「階級出身論」，與「國際派」難分伯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在 1935 年毛澤東主政中共後，「階級出身論」在形式上有較大的改變。黨的領導人已意識到不能再以「出身」問題自縛手脚，中共若繼續奉行昔日嚴格的「階級出身論」的立場，無疑是自鎖門戶，主動放棄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繼續奉行舊時僵硬的「階級出身論」已有瓦解黨和軍隊的危險。儘管中央蘇區在 1932 年已調整肅反政策，但是肅反的核心意識——「階級出身論」——並沒有得到清理；反之，由肅反運動強化為唯階級出身的傾向在 1930 年代中期已發展到極致。例如楊尙昆的妻子李伯釗，因被懷疑為「階級異己分子」和「托派嫌

疑」，便是在被監視的環境下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直到1936年，才被吸收入黨。<sup>10</sup> 少數社會經歷複雜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醫生傅連彰，也是在長征到達陝北後，因毛澤東宣布非黨員經長征皆可入黨，才被吸收為黨員。

從1930年代後期始，中共雖已大規模調整革命的戰略與策略，「階級出身論」也被轉換，但其精神仍然保存了下來，並被改造為一種更精緻的原則，更趨於系統化。在延安時代，「階級出身論」的表現形式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識分子敞開大門；另一方面，又繼續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納知識分子的同時，仍堅持用「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從邏輯上看，這二者間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細加分析，則可發現它們並無任何衝突。

中共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是與共產黨的性質緊密相聯的。抗戰階段，中共領導人一再重申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黨是窮人的政黨」，<sup>11</sup> 黨的基本隊伍只能是工農階級，對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黨雖然歡迎他們參加革命隊伍，但是中共絕不能放棄自己的階級立場，還是要「根據階級看問題，根據階級決定問題。」<sup>12</sup> 抗戰初期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謝覺哉更具體談到黨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要求是：「時刻記住自己是拋棄了、背叛了原來階級，轉到無產階級先鋒隊裏來了。」<sup>13</sup> 所以，抗戰階段對「階級出身論」的調整，具有某種策略性質，並不意味黨放棄了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中共在抗戰階段就是依據這樣的思想邏輯：既不以階級出身問題而將大批知識分子拒之於門外，又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制訂許多具體的政策，將「階級出身論」的基本精神保存下來並發揚光大。針對大批前來延安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共採取的是強化政治思想訓練的方法，引導他們學習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然而，僅僅著眼於學習馬列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知識分子「階級立場」的轉化問題，只有

結合嚴格的黨性鍛煉和經歷階級鬥爭的洗禮，才能真正轉變知識分子的立場、觀點和態度。這是一條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邁入無產階級「門檻」的必由之路，這一步主要通過1942年開始的整風、審幹運動和1947年的土改運動來實現。

從1942至1945年，毛澤東和劉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經由整風、審幹和搶救運動，使全黨幹部，尤其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立場、觀點和態度三個方面實現了徹底的轉變。在思想改造中，階級立場的轉變是一切轉變的基礎。解決階級立場的轉變問題，並不是革命概念的簡單學習和接受的問題，而是要切切實實，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例如，對鎮壓革命的敵人，你是積極參加，還是對敵人心存憐憫？對國民黨蔣介石是抱有幻想，還是敢於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一個人的階級立場必然決定了他的觀點和態度。例如，你是否在心裏還欣賞資產階級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的錯誤思想？你是否心悅誠服地把一切都獻給黨？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剝削階級家庭是骯髒和反動的？你對沒有文化的工農群眾是滿心鄙夷，還是甘心做他們的小學生？你對黨的考驗是真心接受，還是抱冤叫屈？即使像謝覺哉這樣在1920年代入黨的老黨員，也要經過黨的考驗，謝在日記中寫道：「尤其如我這樣在舊社會生長壯大起來的人，遍身沾滿了惡濁，如果不是長期黨的鍛煉，便說自己對階級、對黨是如何抱無限忠心的人，還須得黨加以考驗。」<sup>14</sup>

在1943至1944年的搶救運動中，知識分子幹部普遍都被懷疑為「特務」、「內奸」，而被假定為「特務」的主要依據便是出身不好。搶救運動的偏差以後雖被糾正，但是「階級出身論」卻沒有受到任何批評和清理，相反，因整風、審幹和搶救而進一步滋長。

「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為這種意識與原則有利於黨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聚集社會支持，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加速建成黨的基層結構。抗戰階段，中共爲了

適應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在根據地內修改了江西時期打擊地富的政策，轉而採取聯合地富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在抗戰階段並不是完全無差別的執行的。1944年晉綏地區開展減租鬥爭，「個別地方」對地主採取掃地出門的政策。<sup>15</sup> 抗戰結束後不久，中共面對內戰再起的形勢，迅速將原先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政策。與這個政策相配合，從1947年起，在劉少奇的具體指導下，各根據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開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為中心的土改運動。幾年後，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提到：

在我黨中央做出進行土改的決定和批准土改指導文件之後，從部隊當中抽了一大批黨的同志實際貫徹這一重要措施。當開始實際工作時，除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土改政策外，我們黨的同志犯了許多重大的錯誤。一小部分同志，遷就地主和富農。本應沒收地主富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土地，可我們這部分同志卻憐憫起地主和富農來，給他們留下了私有財產、生產工具，有時還留下了大塊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們黨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開始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和富農。而且，一部分中農也同富農一起被消滅了。[當時，]「左」傾錯誤非常嚴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頭砍下來，用杆子挑著，打著標語沿街遊行。還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來，用棍子挑著，在村裏來回走，號召村民們殺死類似的人。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黨中央得知這些情況以後，立即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消滅人的行為，糾正了產生的錯誤。<sup>16</sup>

為了配合疾風暴雨式的土改，當時黨內還平行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整黨」清洗運動，中共在這場鬥爭中，明確宣示了黨的階級路線，將打擊矛頭對準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和幹部。劉少奇在1947年7月全國土地會議報告中說，土改不徹底的原因在於地主出身的幹部出來阻撓土改，「他估計，在全



國各解放區，實行土改和整黨，將有數十萬黨員和幹部被群眾拋棄，或被批判鬥爭，甚至被審判。」<sup>17</sup> 中共晉綏分局領導人在解釋「階級路線」時用了以下的比喻：「黑老鴉生的白蛋蛋，孵出來的還是黑老鴉。」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劃分農村的階級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兩代、三代的經濟狀況，有的甚至要從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所立的碑文去查證。對於那些已經破落的人也不能輕易放過，因為，「他們前兩輩子壓迫人，好活了，這輩子不給他們黏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們。」<sup>18</sup>

所謂，「黏上些封建」，就是劃為地富成分。對幹部，也採取「查三代」的方法，將那些祖輩曾是地主，現在已成為窮人的幹部，也視為地主的子孫加以清洗。在這次「整黨」鬥爭中，通過「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階級」，即階級出身），最終將「階級出身論」深入到黨員的意識深層，並轉化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達的《華東軍區關於全軍堅決擁護土地改革的命令》規定：出身地富和家庭為地富的幹部，應當堅決拋棄原來的階級立場，不准寫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農幹部，則應堅決保持其階級的純潔性，隨時隨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濟私與包庇、袒護地主的行為。1948年初，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在動員學習土改政策的報告中強調：「土改學習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檢查，更重要的是，階級界線的明確劃分，階級成分的徹底檢查。」<sup>19</sup> 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後，華北根據地部分地委的領導機構還根據幹部的階級出身進行了調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幹部，例如，新任四地委書記楊晴、專員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識分子幹部則被安排擔任副書記。<sup>20</sup>

延安整風運動和土改整黨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共黨內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使得許多知識分子幹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裝束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翻譯家楊憲益回憶，1949年4月，接管南京文化系統的幹部，在與南京知識分子談話時，故



意「裝出一副不文明的樣子來，…… 用手不停地抓撓他那雙骯髒的赤腳」，但其人過去卻是「大學生的知識分子」，而 1949 年「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都像他那樣……，好像自己是老革命。」<sup>21</sup>

從中共創建新政權的效果看，「階級出身論」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社會動員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則建成中共在根據地的社會結構，但在國統區內，中共則以「爭民主，反獨裁」為號召，盡量爭取社會各階層的支持。由於中國共產革命長期以農村武裝鬥爭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最終，「階級出身論」成為創建共產革命政權的最重要的思想與組織原則。

### 區分敵、我、友： 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

1949 年中國共產革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中共的當務之急是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新政權的社會基礎。中共治理新國家的理念與方法離不開自己的背景，「階級出身論」作為革命的新傳統，被加以繼承和發展，其具體路徑就是在全國廣大人群中進行敵、我、友的區分，通過迅速組織「階級隊伍」來重組中國社會的各階層。

執政黨依據蘇聯經驗和中共領導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對社會各階級、階層重新予以定位：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中間階層，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則是新社會的敵人。

位居新社會政治階層第一梯級的是工人階級。在 1927 至 1949 年中共 22 年的武裝鬥爭中，農民一直是共產革命的主體，城市工人階級發揮的作用很小。在建國初期中共黨員的階